

鲁 迅 论 进 化

刘后一 甄朔南 张 锋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不畏艰险，呕心沥血，在那茫茫的黑夜里，运用文艺和科学这两种手段，燃起火种，热望为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开出一条生路。鲁迅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不仅为我们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而且写下了许多宣传自然界进化、发展的科学著作。本文仅就鲁迅在论述和传播进化思想方面所做的工作，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

鲁迅从幼年时代起，常随母亲到附近的农村去。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子弟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增加了许多关于自然界以及生产斗争方面的知识。鲁迅住屋后面的荒园——百草园，是一个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在那里，鲁迅细心地观察了许多动植物的生活习性。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鲁迅不仅无情地抨击了鼓吹孔孟之道的旧教育制度，而且用优美的文字描绘了百草园中生物界的自然景观，可见鲁迅从小就很熟悉他常见的动植物的形态和生态。

鲁迅还喜欢阅读一些生物学、地质学的著作。从远房叔祖那里看到一本专门讲述花草树木，带有插图的《花镜》，曾使他爱不释手。照顾鲁迅的长妈妈为他找到的一本绘图的《山海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地理、地质、古生物学著作)更使他喜出望外。这些书都培养了少年鲁迅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为他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观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1899年，鲁迅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当时正是维新浪潮席卷全国，“西学”大兴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内新学与旧学、反孔和尊孔这两种思潮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严复为维护资产阶级新文化，向封建主义旧文化宣战，投入了批判孔老二、革故更新的战斗。他编译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通俗读物《天演论》的发表，给要求进步的中国人民在世界观上提供了与儒家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截然相反的新观点。当时正以如饥似渴的心情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鲁迅，看到“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与天争胜”等议论，觉得很适合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需要，认为它足以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向反动势力作斗争。

本来，把生物学的规律应用到社会，这是错误和反动的，如帝国主义者将进化原理作为“弱肉强食”、“侵略有理”的理论根据就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要求在这个斗争剧烈的世界上生存，就必须冲破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去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然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不是什么“物竞天择”，而是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进化论等思想武器软弱得很，是抗御不了帝国主义的。

鲁迅在他活动的前期，从当时先进的思想家那里汲取了养料，但又站在超乎一般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思想家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他初步具备的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写了不少宣传进化论的文章，批判了包括孔孟之道在内的唯心主义，同时怀抱着强烈的反帝救国的决心，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1903年，鲁迅在东京，他在《浙江潮》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一开头，鲁迅就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向一切肆意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帝国主义列强大声宣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

在“地质之分布”一章中，鲁迅论述了地球的形成，并且指出，依据气候和化石（文中叫矽石）可以把地质年代划分为代、纪、世等单位，而且按照地质年代讲述了地壳的变迁和生物的发生、发展。如：“至（4）纪（侏罗纪——笔者注，下同）而诡形之龙类……跋扈于陆地（奇异的爬行动物在陆地上横行），有齿之大鸟（始祖鸟）飞翔于太空。盖自有生物以来，未有若斯之瑰奇（奇特）繁盛者也。且菊石、箭石之属，亦大繁殖，其遗蜕（遗骸）遂造成（3）纪（白垩纪）之地层，即学校日用之垂笔（粉笔）亦此微虫之余惠（留下的好处）耳。至（3）纪时，生物界乃大变革，旧生动植，或衰或灭。而真阔叶树及硬骨鱼兴。”

1907年，鲁迅编写出版了《中国矿产志》，在第四章《地层之播布》中，屡次提到化石。例如在“原始层”一节中即提到三叶虫。鲁迅先生写道：

“三叶虫者，动物之高等者也，按进化说，则劣者必先，优者必后（原始的出现在先，高等的出现在后），故意者尔时亦非无至劣动物，生活其间（所以推想当时也不是没有最低等的动物一起生活），特遗蜕模糊，莫能辨识耳（只是遗骸模糊，分辨不清罢了）。”

这里鲁迅指出了化石是生物进化最直接的证据。而且告诉我们：按照进化的时间序列，古老低等的生物类型在地层的底部，而进步的生物类型在地层的上部。三叶虫是较高等的无脊椎动物（属节肢动物门，现已绝灭），在三叶虫以前，无脊椎动物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只是有些类型没有硬壳，不易形成化石罢了。

鲁迅在这一章里还叙述了按照化石划分地层的原则，介绍了每一地层中所含的化石、岩相以及矿产的分布，实际上是用进化的观点阐明了地球发展史和生物发展史，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07年，鲁迅还写了一篇《人之历史》，这是鲁迅专门介绍进化论及其发展史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提出：

“中国途日（近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用以装饰他的文章），而笃故者则病侏人类似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守旧的人则认为把人和猿猴归在一类是错误的，总是以全力反对）。……则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听到新的议论赶快走开），固无足异矣（的确没有什么奇怪的）。”

可见鲁迅宣传人类进化的历史，是有感于时弊而写的。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结合唯心论与唯物论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从神话、迷信传说一直谈到林奈、居维叶、拉马克、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等人在生物学上的贡献以及

在进化论发展史上的功过。例如谈到林奈,鲁迅一方面指出他在创立科学的分类方法(二名法)上的贡献,一方面也指出了林奈是一个神创论者,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者。谈到居维叶时,鲁迅指出了居维叶在比较解剖学及化石研究上的贡献,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居维叶的反动的灾变说。鲁迅对拉马克、达尔文、海克尔等人在进化论上的贡献也都作了高度的评价。

这里还应该指出,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还给“化石”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

“盖化石者,太古生物之遗体,留迹石中,历无数劫(世代)以至今,其形了然可识,于以知(得以知道)前世界动、植之状态,于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实造化之历史,自泐(勒)其业(记载了它们的生活)于人间者也。”

在当时,许多人对化石还不太了解,鲁迅用生动浅显的道理,解释了化石的生成及其用途,不仅普及了化石知识,而且在传播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神学迷信方面,起了革命的启蒙作用。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鲁迅结合古生物学及胚胎学,用简明的图表和扼要的文字把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由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到人类的演化作了总结。最后还特别指出了爪哇直立人的发现,在说明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巨大的学术价值。这是一篇用唯物论思想宣传进化论的文章,对当时中国反对人猿同祖论的人,以及对那些只满足于以华丽的辞藻空谈进化论的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三

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后,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指出这个学说的阶级局限性以外,也及时地予以支持和肯定。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进化论从自然科学上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和发展的哲学。

鲁迅长期投身于革命的斗争实践,并且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好久没有找到。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鲁迅从十月革命中第一次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的传播,为鲁迅送来了新的战斗武器。这时,鲁迅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和社会,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匕首和投枪似的杂文,向他所憎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势力进攻,深刻地剖析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彻底揭露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反动派和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宣扬尊孔复古、坚持复辟倒退的反革命本质。无数血的事实教育了鲁迅,劳动人民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下,用“火与剑”——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理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鲁迅逐渐认识到“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閒集·序言》),从而转变到“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这是鲁迅思想上的飞跃。使鲁迅在阶级斗争的道路上终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和主将。

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急流勇进,英勇地投入战斗,迎接新中国的明天。在此以后,鲁

迅还继续运用生物和人类进化的史实作为武器,宣传世界万物皆变,新生力量必然将代替腐朽没落势力的真理。他怒斥复旧、倒退,号召人们奋起造反,去夺取光明。这样,就使进化论的宣传服务于改革社会这个首要任务,使二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1919年10月,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愤怒声讨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儒家的“伦理道德”、族权、父权等等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他指出: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鲁迅在这里用生物进化的事实作比喻,说明新生的事物总是不可战胜的,绝不是“今不如昔”,这是对当时竭力维护吃人旧礼教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的致命一击,并且提出只有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才能使年青一代获得真正的解放,为此,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号召觉醒了的人们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1926年11月11日夜,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说:

“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他的世界观质变的前夕,这时他已下定决心把自己思想中的“陈迹”埋葬在“坟”里面,他这里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中间类型作比喻,说明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继承和推陈,破旧与立新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总结十八、十九世纪生物科学的成就时曾指出:“自从按进化论的观点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类归到另一类,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4页)。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上述论述,也同样包含着对生物由量变到质变,质量互变的辩证发展的极其深刻的理解。

1927年年底,为了揭穿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宣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鲁迅写了《文学与出汗》,用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事实来论证根本没有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说: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性在不断地改变。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不同的阶级又总是具有不同的人性,即阶级性。鲁迅用这样的例证,正好击中敌人的要害,写的是何等的好啊!

1934年8月,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

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

“专化”,现在一般生物学书上叫“特化”。鲁迅在这里,指出了,特化是古生物绝灭的内因,环境的改变是其外因;这和那种把生物绝灭只归之于外部环境(如气候、食物等等)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的外因论,有着截然的区别。

四

在鲁迅的一生中,一直关注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即使到后期仍然如此。例如在1930年,鲁迅写的《“进化和退化”小引》主要是谈改造社会,但在文章的开头,特别要求人们注意进化论的传播,他说:

“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的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其间学说几经迁流,兑佛黎斯(今译德佛里斯,荷兰植物学家)的突变说兴而又衰,兰麻克(即拉马克)的环境说废而复振,我们生息于自然中,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尝加意。”

鲁迅曾亲自参加《进化和退化》一书的校订,可见鲁迅对进化论著作的出版,一直寄予极大的关注。

由于鲁迅在传播进化论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中政治目的明确,因此他一向反对把科学禁锢在象牙之塔里,主张用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深入浅出地把科学知识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他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中说:

“盖胪陈(平铺直叙)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一篇没看完,就想打瞌睡),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借)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穿上演员的服装),则虽析理谭(谈)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鲁迅在1907年就编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科学探险小说,实际上这两本书是宣传天体的演化和地球发展史的科学普及作品,也贯穿了进化论的思想。比如在《地底旅行》中,谈到在洞穴里的鱼,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光线非常暗,长期适应的结果,眼睛都退化了。这样的鱼,在我国华南洞穴中也可以采到。

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如何把比较深奥的自然科学普及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鲁迅在传播进化论上也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73年12月1日收到)